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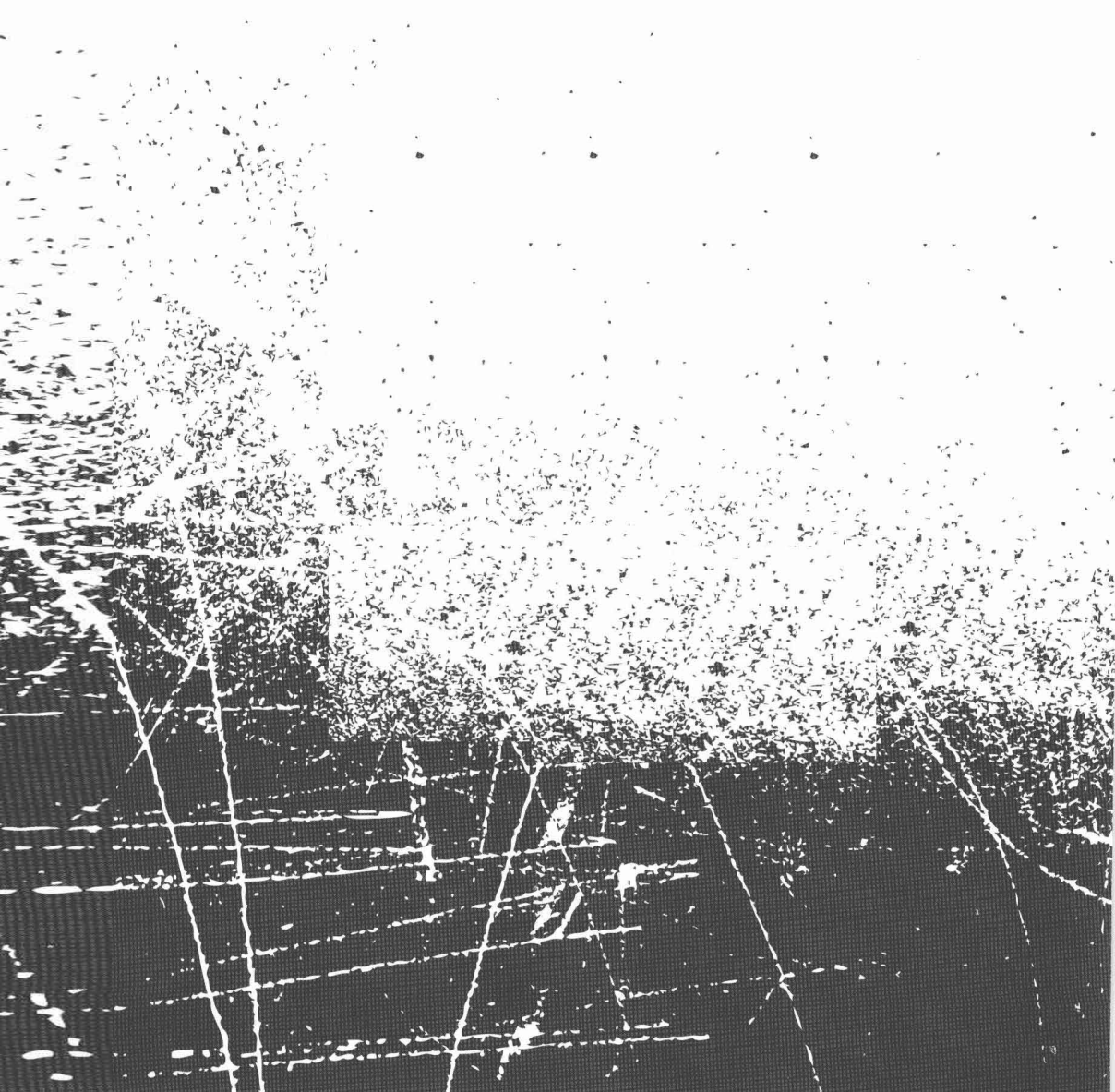
書谷隅考

沈乃文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書谷隅考

沈乃文 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書谷隅考/沈乃文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325-6064-6

I.①書… II.①沈… III.①版本目錄學—文集 IV.①G256.2-53②G257-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1)第189587號

書 谷 隅 考

沈乃文 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麗佳製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787×1092 1/18 印張29 $\frac{2}{18}$ 插頁3 字數466,000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300

ISBN 978-7-5325-6064-6

G·542 定價: 118.00元

如有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自序

北京大學的一百五十萬冊原始古籍，除一小部分存在幾個系裏之外，絕大部分藏在學校圖書館的地下書庫裏。地下書庫有兩層，約四千平方米，其中密布着滿載古籍的樟木書櫃。地下一層書庫南出口的過道邊，有一個不大的下沉花園，陽光可以從此透入過道的窗口。二零零零年以後，我每天就在過道的一個角落裏工作。十年晨昏之間，偶爾因伏案過久喪失了位置感，恍惚覺得是在地面之上，環繞周圍的古籍層壘如山，而自己置身於書山之谷，俱在陽光照耀之下，感覺十分愜意，油然而生一種幸福之感。由於熱愛古籍，辛苦平生所欲得到的，如果說還有一點意義，或許就在此吧。

有一種至今占據主流的說法，認為中國古代藏書樓是以藏為主，落後；西方現代圖書館是以用為主，先進；其實是一種膚淺的臆說。首先古代藏書樓是自藏自用，不能用現代公益理念來評判。其次古代藏書家既收藏，又研究、又校勘、又傳抄、又出版，往往窮盡畢生的心血，對於古籍的瞭解和掌握的水平，對於古籍的保存和續命的貢獻，都是後來通常的圖書館所達不到的。再次古代藏書家周圍都有一個學者圈子，在收藏、研究、校勘、出版等方面頻繁交流。以清中期黃丕烈為例，錢大昕在《竹汀先生日記鈔》卷一“所見古書”中，記載與他的書籍交往三十餘條；鈕樹玉在《非石日記鈔》中，記

載與他的書籍交往近二十條；可見當年之一斑。如果友人遠道而來看書，當年還會提供多日食宿。這些更是後來通常的圖書館所達不到的了。西方圖書館的核心知識是編製目錄和解答諮詢，在電腦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基本為電腦的操作技能所取代。而古代藏書家的知識，對於書籍的研究，對於版本的鑒定，屬於人文學科的研究領域，不可能由現代科學技術全面代勞。甚至一些原來的手工技能，由於最新科技的融入，反而逐步提升為專門的知識。比如對於殘損古籍的修復，即為顯例。

今天的圖書館古籍工作者，崗位是現代圖書館員，業務是古代藏書家的後繼，接受社會以古代藏書家在古籍搜集、鑒定、整理、研究、出版方面達到的水準和成就作為衡量標準的評判。但是古代藏書家的時代過去了，在圖書館的現行體制下，古籍工作者要達到古代大藏書家的水準很困難。由於不是專門的教學和研究單位，雖然獲得的成果與人文學科的成果同類，但是成果只能在時間精力被日常工作基本耗盡之後，鼓以餘勇，利用貼近古籍的優勢，日積月累而成。若干前輩和同儕為了追求貫通的境界，都有超乎尋常的付出，之所以自苦如此，皆為對古籍的熱愛所使然。古籍要求伴書人瞭解它，懂得它，能够真正地利用它和善待它。凡此種種，洵不足為外人道。

古籍的學問在傳統學術中，稱為版本目錄學，現在已經被日漸熱鬧的文獻學、出版史、印刷史等所遮蓋。隨着古籍市場的日益升溫，古籍經濟學或將出世，古籍財經雜誌也可能擺上報刊亭的案頭。但是知其人，論其世，讀其書，應該是研讀古籍的根本。講求版本等則是為探求古籍的正確內容而生發的枝條。探究出版史、印刷史、抄寫刻印工藝等，又是自版本研究再生發的梢葉。雖然以不同側面為中心所形成的研究門類，完全可以齊頭並進，但是版本目錄學研究應該堅持傳統，全面發展，不當棄冷而逐熱。

清乾隆時姚鼐《惜抱軒文集》卷四“述庵文鈔序”云：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古籍研究基本屬於考據範疇。所謂考據，一是發現問題，二是尋找證據。發現問題靠瞭解書，瞭解得越多越深，感覺到問題就越多。而找證據，則一要有心，將問題時刻記在心裏。二要勤快，大海撈針，鍥而不捨。三還要碰運氣。對於傳統學問，今人的基礎不如古

人,特别是没有私塾的根底。古人遺留到今天的問題,基本上都是因為缺乏材料。而尋找解決問題的關鍵材料,不是祇要吃得辛苦,就一定能够找到。運氣欠佳,只能存疑。

因為上述,我不贊成胡適先生“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名言。有前輩學者認為“這十個字是胡適對思想和治學方法最大最重要的貢獻”(《胡適全集》序言。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但是就考據學來說,在拿到關鍵證據之前,大膽假設的結論對於求證具有導向性,同時錯誤的假設會頑強地阻礙形成正確的結論。

以胡適先生做“戴趙《水經注》案”考據為例。趙一清接續全祖望研究《水經注》,於乾隆十九年書成,二十九年趙卒,三十八年書送入四庫全書館,四十六年書抄入文淵閣本《欽定四庫全書》。戴震研究《水經注》,三十年著書初成,三十八年被召入四庫全書館,繼續踵成前書。三十九年寫定官本《水經注》,四十年武英殿排印官本《水經注》,四十一年戴重定刊行前書,四十二年戴卒。檢乾隆三十九年之武英殿聚珍版本、四十二年之《欽定四庫全書》本、四十四年之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本,三者中的《水經注》提要相同,可信出於戴手。提要反復恭述校勘依據的是《永樂大典》,目的明顯是為了取悅乾隆帝。但是經注中的若干文字異於《永樂大典》,却與趙一清書相同,以致當年在四庫全書館中,即有戴太史參用趙書,且無一言及之的議論。到了民國影印《永樂大典》行世之後,議論遂成主流。

一九四三年末胡適先生着手考訂此案。他於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台灣大學文學院的演講中說:我審這個案子,實在是抱打不平,替我的同鄉戴震伸冤(《胡適言論集》甲編,臺北華國出版社 1953 年)。就是說胡先生大膽假設為戴震蒙冤。然而要證明戴沒有參用趙書,必須得到戴在乾隆三十八年入四庫全書館之前初成稿本的相關文字,已經與趙書相同的證據。胡先生考證了二十年,沒有拿到關鍵證據,但是也未承認戴確有參用趙書的可能,所作的戴沒有見過趙書、戴趙是各自研究得到了相同結果等論述,都不能從根本上排除戴參用過趙書的嫌疑,不能完全說服人,也不能成為真正的結論。所寫的關於戴、趙和《水經注》的二百多篇文章,絕大多數也沒有

能在胡先生生前發表。胡先生曾經說，他的研究着重解決方法論的問題。那麼他考證“戴趙《水經注》案”的例證所說明的是：考據學在取得關鍵證據之前，不宜假設任何結論，應該不帶任何主觀色彩地尋找證據，根據獲得的關鍵證據得出純客觀的結論。

因為做有關古籍的工作，解決日常工作中涉及到的問題，零零散散地寫了一些文字。一九九七年鄧廣銘先生教導：寫了文章一定要發表，藏之名山不可取。遂陸續刊載在一些刊物上。由於事先沒有通盤的計劃，不是按部就班地完成，所以門類題目都很分散，只能說基本都是依據古籍做考據，偏重版本的稍多。許多題目還有後續的餘地，也想續作，但是何時能夠着手，全在未知。

古人描述收藏古籍之多為坐擁書城。所謂的書城，至多傳承三、四代，藏書數萬冊，號稱幾十萬卷，就不得了了。以今天北大位居世界前幾位的古籍收藏來說，不啻十數倍於當年的頂級者。祇此一點，已經是千百年間的古代讀書人所不能奢望的。《紅樓夢》中的頑石感嘆“無才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回首時光，冒昧套用，可以說是：幸入書山若許年。又幸何如之。最大的遺憾是母親已經於六年前過世，墓草萋萋，孤獨無訴。茲斂集山脚的些許雲影落花，聊誌光陰而已。

疏誤之處，佇候方家的教正。

2010年12月24日晚寫於肯德基快餐店托盤內宣傳紙背面

目錄

自序	1
朱彝尊與《經義考》	1
《禮記集說》版本考	39
米萬鍾與勺園史事再考	57
戴震與方志及其手稿與胡適跋文	105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地方志珍本叢刊》序言	135
《版本目錄學研究》出版致詞	163
古籍書目的三種功能與傳統目錄學的三個層次	167
清代書目題跋選叙——《海王邨古籍書目題跋叢刊》前言	223
藏園落英在北大	245
也談孔子劍刻碑	319
陸心源的親筆信劄與書畫收藏	327
《事文類聚》的成書與版本	339
《永樂大典》第一五九五七、一五九五八卷影印前言	357
宋雕“崇寧藏”“毗盧藏”殘卷考	363

胡仔與《苕溪漁隱叢話》	425
《清彩繪本桃花扇》影印序言	455
關於《岳飛傳》與胡適藏書——沒有實現鄧廣銘先生心願的兩件事	469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古籍的價值及來源	475
 附錄	
國家標準《GB3792.7 古籍著錄規則》修訂概要	493
中國圖書在版編目的開端	501
中國應建立自己的古籍書目資料庫	509

朱彝尊與《經義考》

起 首

朱彝尊是清初著名的詩人和學者，字錫鬯，號竹垞、小長蘆釣魚師、金風亭長，浙江嘉興人。生於明崇禎二年（1629），卒於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享年八十一。在彝尊一生的史事中最受當時和後代議論的，是他青年時以明代狀元之後自視，家中雖無恒產，入清卻不事科舉，甘守清貧。然而過了五十歲，卻又應召出仕，在兩遭罷官之後，終於歸田。如此行止雖然難免為時人和後人所笑，卻促使他完成了經學巨著——《經義考》。

《經義考》是一部以考證歷代經學著作的內容和存佚為目的的書目，收錄清初以前成書的八千四百餘部經學著作，條目依書籍內容的類別和著作年代的先後排列，標示存、佚、闕、未見四種情況，並以歷代的序跋和評論作為解題。彝尊自己撰有七百餘條考證，以按語的形式附在有關的條目之後。全書反映了歷代經學著作的全貌和源流，評述了作者的概況和著作的得失。

歷史過去了近三百年，彝尊其人和《經義考》其書，以及書的傳刻源流與版本優劣，歷經學者研究，至今仍然具有探討的價值。與有關討論相伴隨

的，是從中還可以獲得對於歷史、學術，以及學人自身發展歷程的某些感悟。

一、關於朱彝尊

甲、朱彝尊的家世與其大半生的漂泊生涯

朱彝尊一生的作為，自然是由他的生平經歷所決定的。與常人有所不同的，是他的生平受到他的家世的很大影響。

彝尊的遠祖是莊戶人家。高祖朱儒行醫，仕至太醫院院使。最使彝尊引以為榮的，是他的曾祖父朱國祚曾中萬曆十一年狀元，先後任翰林院修撰、南京禮部尚書、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卒諡文恪，《明史》有傳。祖父朱大競在天啓末任工部營繕主事，在崇禎間任雲南楚雄知府。與後人通常的想像不同的，是國祚雖然位至宰輔，但操守清廉，身無餘財。而大競宦途短暫，最後僅以敝衣一簞還家。到了彝尊的父親增廣生朱茂曙於明亡後退隱，日與枯棋濁醪相伴，和過繼彝尊為子的大伯復社分子朱茂暉遁荒，且晚歲失明的時候，朱家的境況已是極為困窘。加上浙江先在明末遭受嚴重的旱災和蝗災，又在清初遭受兵亂，使得彝尊的童年不僅不曾有過錦衣玉食的生活，反而是備嘗艱難。他於十七歲入贅歸安教諭馮家，十八歲吟詩：“我欲悲歌，誰當和者？四顧無人，瑩瑩曠野。”（《曝書亭集》卷二“悲歌”）表露了他在國難家愁之下的苦悶心情。二十一歲時，他攜妻、子，竝接親父移居梅會里，以授徒自給。

在彝尊的青年時代，不接受明亡的現實，圖謀恢復，甚而希望以此成就個人功名者，還大有人在。江浙一帶，慈溪魏耕、歸安錢纘曾、山陰祁理孫、祁班孫（祁彪佳兩子）和朱士稚、長州陳三島等人即是其中的一群。順治十六年，鄭成功水師克鎮江，迫南京。張煌言師下儀真。隨後相繼敗北的重大軍事行動，即與魏耕等人的活動有重要關係。三島、士稚因是憂憤而死，耕、纘曾等因事泄於康熙元年受極刑，班孫等同案犯遣戍寧古塔，理孫鬱鬱而亡。彝尊與廣東番禺屈大均在順治十五年至康熙元年之間，與上述諸人來往密切。對於身為明代名臣之後的彝尊來說，這是自然和必然的。二三十

年代郭則澐先生鈎稽此段史事，於《十朝詩乘》卷一謂彝尊與上述諸人是“往來其間”的關係，表述有據。稍後鄧之誠先生再考是事，於《清詩紀事初編》卷二“魏耕”條、卷七“朱彝尊”條中，將彝尊在密謀中的作用，與魏耕等人同等看待。以後的研究者通循鄧說，以彝尊為魏耕秘密抗清活動的重要成員。

此段史事的結案，處於順治十八年五月倪用賓、金聖歎等蘇州哭廟案，和康熙二年五月歸安莊廷隴《明史》案兩大獄之間，殺戮不及前後案多，檔案難尋。且由於當事人均罹禍，知情人緘口自保，難考其詳。然檢曾經與祁班孫一同流放寧古塔的楊遷的兒子楊賓所撰“魏雪竇[即魏耕]傳”、“祁奕喜[即祁班孫]、李兼汝合傳”兩文(《楊大瓢雜文》)，和後代考據此事引用最多的全祖望所撰“雪竇先生墳版文”、“祁六公子[即祁班孫]墓碣銘”兩文(《鮚埼亭集》卷八、卷十三)，以及楊鳳苞於嘉慶八年“據潘居貞《菊旂日記》及無名氏《湖城大獄記》二書”所撰“書孔孟文事”(乃文按：此文即黃裳先生於《翠墨集》內《吳越詩選》條下，所錄費寅抄稿本內之無名氏文)，於嘉慶二十一年所撰“錢瞻百《河渭間集選》序”兩文(《秋室集》卷五、卷一)，諸文所記載的涉及魏、錢一案始末的有關人員中均無彝尊，可見康熙至嘉慶時人並不認為彝尊係此群中人。再考魏、錢一案的整個過程，為鄭成功、張煌言密謀、報信者，主要是魏耕。續曾等少數幾人是參予密謀者，而大均、彝尊等人則屬週邊分子，其間沒有有組織活動的跡像。所以，雖然可以相信彝尊基於他的家世而不滿新朝，但從他的自身資質和反抗意識來看，他還夠不上是自願投身危險鬥爭的志士，也非清初鎮壓重要反抗分子時的漏網之魚。

彝尊於二十五歲客華亭衙署，二十八歲館嶺南高要知縣楊雍建家，二十九歲客廣東左布政使曹溶衙署，三十二歲客山陰道員宋琬衙署，三十五歲客永嘉衙署，三十六歲先遊京師，遂客山西按察副使曹溶衙署，三十八歲客山西布政使王顯祚衙署，三十九歲客宣府守備嚴宏衙署，四十歲客山東巡撫劉芳躅衙署，四十二歲、四十四歲兩度重遊京師，四十五歲客潞河僉事龔佳育衙署，四十九歲客江寧布政使龔佳育衙署。彝尊自敘：“仆頻年以來，馳逐萬里，歷遊貴人之幕，豈非饑渴害之哉！……昔之翰墨自娛，苟非其道，義不

敢出。今則徇人之指，爲之惟恐不及。”（《曝書亭集》卷三十一“報周青士書”）可見他大半生奔走於南北的遊幕生涯，非出情願，乃家貧所迫的結果。明代狀元和宰輔之後的顯赫家世，使得彝尊不願入仕爲清廷所驅使，在對貧寒的忍耐中，渡過了她的青、中年時期。

乙、朱彝尊的晚年出仕與兩遭罷官

朱彝尊以名門之後，入清以布衣自處，在當時被公認爲是有學識和有氣節的人。王士禛曾經感歎：“嗚呼！以文恪公之德，錫鬯之才，不得比於唐宋之世臣，而老於布衣，僅以文章自見，蓋遇不同矣，是可感也。”（《竹垞文類》“序”）出於時人意想之外的，是他於康熙十七年接受嚴沈、李宗孔舉薦，人都應博學鴻詞科試，領食俸廩，次年中殿試一等，除翰林院檢討，任《明史》纂修官。這說明以學問和才華出人頭地，換取地位和待遇，對他來說比清高和氣節更重要。或許他認爲明亡已久，自己亦非明官，事清談不上失節。若細讀彝尊於客幕時所作的“自題畫像”詞，體會他“菰蘆深處，歎斯人枯槁，豈非窮士？剩有虛名身後策，小技文章而已。四十無聞，一丘欲臥，漂泊今如此。田園何在？白頭亂髮垂耳”（《曝書亭集》卷二十五“百字令”）的心境，毫無疑問，着布衣是無奈的，祇要清廷給予適當機會，入宮是必然的。

康熙十九年彝尊充廷試讀卷官，典江南秋試，同年授徵仕郎。二十一年侍班乾清宮，知起居注。二十二年入值南書房，賜居禁苑，充《一統志》纂修官，又得恩賜禁中騎馬。皇家大內，對他真個是恩寵有加。他於此期所作的，如乾清宮侍宴之“既醉盈觴酒，萬壽無疆詩。夢遊真不到，今夕奉恩私”（《曝書亭集》卷十一）一類的阿諛作品，舒發的都是真實的心情。甚至捧他“忽一旦登金門，上玉堂，名動人主，傳之後世。……究之天地生才，國家用之，要未有才大而不遇者”（顏鼎受“《竹垞文類》序”）一類的昏話，他也欣然接受，顯然是有些飄飄然了。

康熙二十三年彝尊五十六歲，元旦日領到康熙帝賜下的兩席肴果，全家叩謝天恩甫畢，他即遭到掌院牛鈕（字樞臣，赫舍里氏，康熙二十一年五月除掌院學士。非當時之禮部右侍郎牛鈕，他塔刺氏）彈劾，指控他私帶楷書

手王綸入宮抄錄四方經進書，隨之謫官，逐出賜第，遷居宣武門外。

今天看其事背景，一是當年博學鴻詞科試，中一等的二十人、二等的三十人全入翰林，則朝內以帖括進身者，難免心理失衡，形成“以資格自高者，合外內交構”（《曝書亭集》卷七十六“編修嚴君墓誌銘”）的局面。五十人中全無科第者為彝尊、李因篤、潘耒、嚴繩孫四人，時稱四大布衣，被譏為野翰林，屢遭設計排擠。二是原來對不與清廷合作者的操守持欽敬態度的輿論，此時對其中的應徵者轉持批評和譏諷的態度。王士禛致書友人曰：“今歲鴻博，東省惟諸城李渭清一人，餘皆江浙間人。予近有題墨菊絕句云：由來苦節本難貞，莫向東籬問落英。徵士今年滿京洛，不知何處着淵明。”（李佐賢《吾廬筆談》卷二）屈大均賦詩“寄富平李子[即李因篤]”：“鴛湖朱十[即朱彝尊]嗟同汝，未嫁堂前已目成。”（《翁山詩外》卷十一）考是科所取五十人中，“江南二十六人，浙江十三人，順天、直隸六人，江西二人，山東、河南、陝西各一人”（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二），並非餘皆江浙間人。然而士禛、大均係彝尊知友，嘲諷如此，何況他人。三是清初志在復明的知識分子尚多，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衆人。康熙帝採取拉攏政策，科外開科，設《明史》館，即意在安排此類分子。《鶴徵錄》內李集記載第一科舉薦一百八十六人，應試一百五十四人。李富孫、李遇孫指出試者中有六人未與試，未到者中有一人與試，應試共一百四十九人。秦瀛《己未詞科錄》補記辭不就者十二人、後期末試者一人、舉不及期者一人、補遺二人，試者中一人未與試，則當年舉薦共二百零二人，應試共一百四十八人，不乏缺席者。顧炎武即拒絕應召，吳龍錫詩贊：“到底不曾書鶴板，江南惟有顧圭年。”（蔣超伯《通齋詩話》卷上）而康熙帝拉攏的目的一旦達到，被拉攏者當初的價值就沒有了。李因篤未入史局，即以養母歸田。彝尊四年後謫官。潘耒亦於四年以浮躁降調。而嚴繩孫“遇人樂易，好和不爭，以是忌者差少”（“編修嚴君墓誌銘”），但假歸晚彝尊謫官還不到一年。顯然卷鋪蓋回家是他們必然的結局。

但是正在感戴“全家賜食古來稀”的幸福時刻，突遭謫官，對於彝尊來說，無異從天上跌回了地下。始歎“誰憐春夢斷，猶聽隔城鐘”（《曝書亭集》

卷十二“自禁垣徙居宣武門外”),繼之宦海感受,牢騷不滿見諸詩文,生活也陷窘境。待到二十九年補了原官,雖然沒有流傳謝恩之作,但從他立即召妻進京來看,還是得意的,詩中意興也漸高,然而歡喜未久,三十一年正月又復罷官。這再次罷官的實質,自然與前次相承,但直接的因由,至今仍是謎案。

彝尊在史館主筆成祖和洪武朝臣三十餘人傳記,二十三年後史館統稿人是不接受任何職務的萬斯同。三十年七月史館監修徐元文病歿。康熙帝當時正一心對西北的噶爾丹部落用兵,三十一年正月閱看了四百十六卷《明史》稿本後,傳下的旨意冠冕堂皇,與彝尊七次“上史館總裁書”(《曝書亭集》卷三十二)中的意見竝無不合。但彝尊於此時被罷官,與上述諸事不會全無聯繫。傳說徐乾學、高士奇、王鴻緒在朝結黨,作成彝尊首次罷官。但此時,乾學已於二十九年因許三禮彈劾歸省。士奇於二十八年由郭琇彈劾休致。鴻緒亦於二十六年丁憂回籍,二十八年服未滿又被郭琇彈劾植黨營私,雖經蒙旨開釋,但再得奉召進京已是三十三年。均應與彝尊二次罷官無涉。又傳彝尊曾詠史:“漢皇將將屈群雄,心許淮陰國士風。不分後來輪絳灌,名高一十八員功。海內詞章有定稱,南來庾信北徐陵。誰知著作修文殿,物論翻歸祖孝徵。”“讀是詩者,謗議橫生,不久遂湖山放廢矣”(《郎潛紀聞》卷五)。詩中諷及者及謗議彝尊者,傳為士奇。考“詠古二首”在《曝書亭集》中排在卷十三,康熙二十六年冬,似非三十一年之事因。且士奇與彝尊之間似存相惜之情,彝尊曾以姚雲東繪“寒林鸛鵒”圖為歸田的士奇賀壽。士奇題:“鸛鵒無言立北風,阪村竹樹自成叢。不知鎖向雕籠者,得似寒山野水中。”末句:“茂林茆屋棲遲慣,忘卻多年直禁中。”跋:“昔與竹垞同直南書房,每有江湖之思,今共在寒山野水中矣。”此類情事是否如鄧之誠先生於《古董瑣記》中所釋,表現了士奇的虛偽與彝尊的胸懷,不易細考。或可說道的是,此畫後來流入宮禁,乾隆帝諷題:“鸛鵒何曾畏北風,雕籠常鎖海棠叢。竹窗既有江湖思,何事頻懷玉禁中。”(《十朝詩乘》卷六)可謂一針見血。彝尊之孫朱桂孫、朱稻孫於彝尊晚年常伴左右,兩人撰《祖考竹垞府君行述》云:彝尊“越二年,補原官,明年正月復罷官。”言當有據。因無彝

尊二次受劾的記載，可能是在冷遇和被示意離開的情勢之下，不得不告老回家了。

白首出仕，官不過七品。辛苦五年未得升遷，反遭罷官。苦等六年後復官，僅一年再遭罷官，最後不明不白地回家。這豈非後人的笑柄？怨憤不平之氣自首次罷官後，即長期隱忍於彝尊胸中，晚年宣洩於書櫝之銘：“奪儂七品官，寫我萬卷書。或默或語，孰智孰愚？”（《曝書亭集》卷六十一）他要努力以自己的作為和成就，來證明自己的價值，宣示天下，使內心得以平衡。萬卷書是何書？銘中未予指明，必係長篇巨制，方不負他的才名。

丙、朱彝尊編撰經學巨著的背景

朱彝尊初以詩詞成名，一生成就也以文學為最高。傳說他自幼就對遣詞用韻具有極強的領悟力。其詩作宗法唐風，受杜甫、李白、明七子的影響，同時具有用字典雅和重視節律轉折收放的藝術特色。中年後進入詞苑，詞作推崇南宋，工緻委婉，情真感人。其詞作和詞論影響了清初一代的詞風。今天看來，當時的彝尊已經無愧為清初詩壇，或者說是清初浙西詩壇的代表人物。但在當時，詞章屬於小道，經學才是封建制度和道德倫理的基礎，因而學人必以經學立身。

彝尊幼年，改朝換代的大動亂已現端倪，他先是聽從叔父朱茂皖的勸導，“河北盜賊，中朝黨朋，亂既成矣。何以時文為？不如舍之學古”（《靜志居詩話》卷二十二。又，陳廷敬《竹垞朱公墓誌銘》謂語出彝尊，誤）。而後明朝覆亡，清祚鼎立，遺民們痛定思痛，認為明之喪國與盛行已入空疏之途的理學有關，又念終明一代以八股取士，而國毀之際獻身者無多，遂對理學和科舉持否定態度。黃宗羲等人改以漢學治六經，作為治其他學問和詞章的根底。其他的學者出於多種思想動因，也紛紛致力於經學，在清初形成了經學發展史上的一個有特色，至今需要作的研究還很多的階段。

這個階段特殊的政治、學術環境和個人狀況，使彝尊自幼即走上了不以應舉為目的，但一生遍讀經史，考求經史古義的治學道路。他在二十二歲表明心跡：“為文思以塚葬，對客寧將硯焚。當年必無鍾子，後世定有揚雲。”（《曝書亭集》卷二“放言五首”）以後“客遊南北，必橐載十三經、二十一史

以自隨”，同時注重以文物和金石考古材料參訂古書的記載。彝尊所取得的不同於流俗的學術成就，受到當時有識之士的高度評價，“一時東南文學士遊京師者，共推謂爲老師宿學”（《竹垞朱公墓誌銘》）。彝尊在遭受罷官打擊後，擬予撰寫的萬卷書，無疑當以經學立世，而且要闡述他的治學宗旨。

彝尊深究經史本原的治學方向，要求盡可能多地占有材料。他所編的《日下舊聞》引書一千三百餘種、《潛采堂宋人集目錄》錄書一百六十九種、《潛采堂元人集目錄》錄書一百四十八種、《明詩綜采摭書目》錄書二百八十二種、《全唐詩未備書目》錄書一百七十一種、《兩淮鹽筴志引證書目》錄書三百十二種，皆可見其讀書的廣博。

彝尊又以不過溫飽的家境，終生致力於藏書，其中的艱辛不難想見。他曾自述：“先太傅賜書，乙酉兵後罕有存者。予年十七，從婦避翁地六遷，而安度先生〔即朱茂曙〕九遷，乃定居梅會里。傢俱率一艘，研北蕭然，無書可讀。”十餘年後，“遊嶺表歸，閱豫章書肆，買得五箱，藏之滿一櫝。既而客永嘉，時方起明書之獄，凡涉明季事者，爭相焚棄。比還，問曩所儲書，則竝櫝亡之矣。”可知朱家先世藏書基本毀於順治二年的兵亂，康熙三年前彝尊以館客所得購置的書籍，又在莊廷隴大獄後的文字掃蕩中蕩然無存。“其後留江都者一年，始稍稍收集。遇故人項氏子，稱有萬卷樓殘帙，畀以二十金購之。時曹侍郎潔躬、徐尚書原一皆就予傳抄，予所好愈篤，凡束脩之人，悉以買書。”（《曝書亭集》卷三十五“曝書亭著錄序”）像歷代藏書家都重視訪求前代藏書家故物一樣，彝尊的文章中也時常透露出諸如“隋著作郎杜臺卿所撰《玉燭寶典》十二卷，見於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予嘗入閩訪陳後人，已不復可得”（《曝書亭集》卷三十五“杜氏編珠補序”）一類的訪求經過。當時的書價，按彝尊“今則操一囊金入江浙之市，萬卷可立致”的說法，尚非高昂。但其收書是“餬口四方，經過都市，殘編斷帙，至典衣予直，積之二十年”，就相當困難了。同時，市面上的書或以時用者爲多，“自博覽者觀之，若無所見也”（《曝書亭集》卷六十六“池北書庫記”）。因此彝尊一生積書的主要方法不是買，而是抄。當時的學者之間有互相借書抄錄的風氣，黃宗羲即顏其藏書處爲續抄樓，曹溶更撰有《流通古書約》。這既是由於書籍